



利益算计
权力斗争

消息传出,驻朝清军另外两个营的长官决定立即向国内朝廷报告,听候朝廷的指示,但袁世凯坚决不同意,他认为特殊情况应特殊处理。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,如果等朝廷的指示下来,日本人都成为太上皇了,因而必须趁日军的势力在朝鲜还未站稳,当机立断,平息政变,维护大清国在朝鲜的利益。

由于袁世凯的态度很坚决,最后其他两个营的长官同意:由袁世凯率领他们的部队攻打日军占据的朝鲜王宫,他们



袁世凯的苦恼

两个营帮忙策应。

袁世凯又一次出手了。和上次一样,他带领手下士兵冲锋陷阵,锐不可当,日军仓皇逃窜。在赶走王宫里的日军后,袁世凯又煽动首尔的流氓地痞(跟他关系很好),在街上见到日本人就砍,并且一把火烧了日本大使馆。在混战中,袁世凯成功地解救出被挟持的国王,护送他回宫,并拿出自己的军费(朝鲜王宫没钱),亲自做被谋杀的事大党大臣家属的抚恤工作。

由于袁世凯的一系列行动,朝鲜又一次恢复大清国藩属国的地位,国王被日本人挟持期间发布的对大清国不利的政令通通废除,大清国的利益再一次得到维护。

袁世凯在这次平乱中表现出了军事上的果断和政治上的成熟,他在朝鲜的地位更加巩固了。后来,大清国撤去了在朝鲜的驻军,而袁世凯仍然没有被调回国,成为大清国派驻朝鲜的最高领导——大清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。

这个官职在大清国相当于道员(正三品)。他实际上是大清国派往朝鲜的全权代表——监国。为什么不直接叫监国?这是为了避嫌。当然叫大使也不行,因为爱面子的大清国认为,“属国无外交”,派到小弟那里去的,自然要避免使用外交上的一些叫法。所以打着“通商”的牌子,来行使监国的权力。

虽然是“官二代”,但袁世凯的一切还是靠自己奋斗得来的,他能力强又舍得付出,所以对于他在朝鲜坐到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别人是没有异议的。

就这样,袁世凯开始了他在朝鲜漫长的生活,这一驻扎就是13年。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异国他乡,在大清朝廷的大臣几乎把他遗忘的时候,在日本人的处处包围和挑衅之下,袁世凯几乎以一人之力一次次成功抵抗和反击,坚守大清国的利益底线,日本人对油盐不进、作风强硬的袁世凯很是头疼,先是想撵走袁世凯,然后又实行暗杀,都被袁世凯躲过了。

由于袁世凯十分强硬和狡诈,朝鲜国王在他面前只能用一词来形容——战战兢兢。袁世凯不仅可以随意出入王宫,还要对国王说的话办的事指指点点。当时朝鲜国王发给各国的外交文件除了盖上玉玺,还必须盖上袁大人的大印才能生效,在重大事情上请示通报也是少不了的。在袁世凯出入王宫期间,打听到朝鲜王妃还有一个妹妹,就将她纳为自己的三姨太,然后又成功地把这个姑娘的两个陪嫁丫头纳为侧室。

总之,在外人看来,袁世凯在朝鲜是很风光的。他也有了独轮车,正所谓春风得意有人参,独轮车上抱美人。

但谁也不知道,这个时候的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麻烦——准确地说是他

的苦恼。

因为这些不是他想要的,他想要的

不止这些。在朝鲜期间,袁世凯不停地向主管他的国内领导打报告,要求回到大清国的怀抱,但没人理他。

没人理他的原因很简单:因为袁世凯的工作业绩实在太突出了。他能搞定日本人,就让他继续搞定。一来二往,袁世凯相信: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,他就可以在朝鲜养老了——领导赏识你,没有办法啊。

前几年,我曾在一个自称职场大师的讲座里听到这样一个观点,当时觉得很新鲜:如果你是某个部门或者某项业务的领导,工作不能做得太出色,否则你的上级就会认为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来替代你,你也就很难有再升迁的机会。

当然,这位大师的观点是不对的。因为他只看到了表面和眼前,所以显得比较小家子气。他一定还不知道有另外一种观点:做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。

既然你都是一个方面的领导了,就别老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,生怕别人割了你几垄麦子。事实上,当领导的不光要能力突出、扎实肯干,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放权,也要注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。

(摘自《大清灭亡启示录(1894—1911)》作者 黄治军)



徐悲鸿与孙多慈



读《作家文摘》
品五味人生

1928年,徐悲鸿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,全家由上海迁居南京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,居住在一幢两层的旧式楼房里,楼里共住有4家人,徐悲鸿居住4间房子,蒋碧薇的父母也与他们住在一起。由于居室太小,徐悲鸿总到艺术系画室去作画。后在钱昌照等朋友的帮助下,徐悲鸿聚积卖画所得,于1932年在南京付厚岗6号建造了一座带有画室的公馆。

徐公馆于1932年12月建成,是一座精巧别致的两层小楼,有客厅、餐厅、卧室、画室、浴室、卫生间等,前后还有宽敞的庭院,院内有两棵高大的白杨,四周用篱笆筑成围墙。徐悲鸿搬进新居时正是“九一八事变”发生一年后国难沉重的严冬,徐悲鸿不忘国耻,居安思危,便将新居取名为“危巢”。但蒋碧薇认为此名不吉利,不久就取消了。蒋碧薇将公馆布置得很典雅,庭院梅竹扶疏,桃柳掩映,令人赏心悦目。可舒适的环境未能给徐悲鸿带来快慰,反使徐悲鸿郁郁寡欢,愁肠百结。

徐、蒋结婚之后,性情不甚融洽,兴趣差距很大,此时蒋碧薇醉心于应酬享受,徐悲鸿则潜心于授课与绘画艺术。由于事业上没有共同的语言,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关爱,徐悲鸿常处于苦闷之中。在他精心任教之时,对女弟子孙多慈的才能颇为欣赏,常常课外点拨,师生感情甚笃,不久两人坠入爱河。徐悲鸿刻一印章曰“大慈大悲”,即暗合二人名字在内。事后为蒋碧薇闻之,她大肆吵闹,孙父对女儿的行为也极力反对,不许悲鸿与其女来往。一时间,许悲鸿与孙多慈的绯闻闹得满城风雨。

在徐公馆落成之时,孙多慈特购枫树苗百株作为其点缀庭院之用,也

为祝贺老师新画室的建成。但此事又被蒋碧薇得知,蒋怒不可遏,嘱咐佣人将树苗尽折之,做柴火之用。悲鸿异常气恼,但慑于夫人之威他忍气吞声,悲痛之余,乃言其室为“无枫堂”,并刻“无枫堂”印章以抒郁愤之情。那一时期他也常画枫树,每幅画必钤上“无枫堂”印章。此后徐蒋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。

急雨狂风势不禁,
放舟弃棹迁亭阴。
剥莲认识中心苦,
独自沉沉味苦心。

小诗录以少陵道兄 悲鸿

这是徐悲鸿在隐痛中写的一首诗,显然不是为好友王少陵写的。王少陵居纽约,一直将徐氏的手写诗悬挂在客室中,知情者一看便知这诗是写给一位心爱的女子的。据王少陵说,徐、孙二人分离多年仍书信不断。当年王少陵从大陆回美国,临行前向徐悲鸿告别,徐悲鸿正在画室内写这首诗,得知王少陵即将回美时,徐悲鸿要画幅画送给他留作纪念,因王少陵要赶飞机,便向徐悲鸿要了这首墨迹未干的诗,徐悲鸿说这是写给孙多慈的。后来孙多慈每次去美国看王少陵时,看到挂在墙上的这首诗都心酸落泪。

孙多慈后来嫁给了许绍棣,婚后她十分后悔,二人之间从来没有感

情,年龄也相差二三十岁,经常发生口角。许绍棣是坚决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“堕落文人鲁迅”的党棍文人,在其妻生病期间,许绍棣看上了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,他答应如果王映霞和达夫离婚后,许绍棣又看上了更年轻貌美的孙多慈。孙多慈爱徐悲鸿,但徐悲鸿无法和蒋碧薇离婚,许绍棣的妻子死后,在许绍棣的追求下,孙多慈嫁给了许绍棣。

婚前孙多慈以为许绍棣是位有学问的人,婚后才知许绍棣实为无知之辈。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,孙多慈只有认命,后来便随许绍棣到了台湾。但她一直看不起许绍棣,十分思念徐悲鸿,经常借故从台湾去美国,住在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家里。

1953年9月,孙多慈去纽约参加一个艺术研讨会,正在画友们见面高兴之时,突然传来徐悲鸿逝世的消息,孙多慈听后就昏厥过去,她清醒后痛苦万分,面色惨白。她一生只爱徐悲鸿,当时表示要为徐悲鸿戴孝3年。后来她果然当着许绍棣的面为徐悲鸿戴了3年孝。由于长期郁悒,孙多慈不久就染上了病,后在美国病逝。

(俞允尧)

(摘自《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》)